

《异形·契约》：具身化的人工智能与后人类之困

霍 爽（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讲师）

摘 要：文章以科幻电影《异形·契约》为切入点，探讨具身化人工智能在后人类语境下的影像表达与哲学意涵。通过分析影片中人工智能角色大卫与沃尔特的具身性和意识结构，揭示当代科幻影像如何重塑技术与生命、意识与身体之间的边界。在技术拟像与哲学思辨的交汇处，电影作为媒介不仅映射出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焦虑，也引发关于主体性、本体论与后人类身份的再思考。文章尝试在艺术表现与科技图景之间，建立一种媒介哲学的解读路径，从而拓展对未来技术社会的美学和伦理理解。

关键词：《异形》；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主体性；后人类

《异形》系列影片为恐怖科幻电影开辟了新的表达范式，其著名宣传语“在太空中，没人能听到你的尖叫”不仅彰显了未知宇宙的恐惧氛围，也象征着人类面临技术异化的深层焦虑。在这一系列影片中，带给观众震撼的，远不止异形生物本身，更有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生命体所构成的存在性威胁。自2012年《普罗米修斯》初步揭示异形起源以来，2017年《异形·契约》进一步完善了整个叙事体系，而人工智能角色大卫成为贯穿前传的重要核心。他的觉醒与越界不再是机械功能的升级，而是对人类伦理、造物权力及主体性地位的正面挑战，揭示出后人类时代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深远变革。

一、人工智能的幻想——具身化背后的虚拟性本质

身心观一直以来都是古希腊乃至西方哲学传统中长期关注的核心议题。该观念经历了从“扬心抑身”到“身心一体”的演变：柏拉图主张感性事物的美是分有“理式”的美，由灵魂隐约回忆到依附肉体以前所见到的真美；黑格尔认为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只有心灵才能涵盖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在涉及这较高境界而且由这较高境界产生出来时，才真正是美的；亚里士多德把灵

魂看作不可与身体分离的生命形式，灵魂是身体的活动，而不是限制身体的分离实体^[1]。科幻电影是当代哲学议题的视觉转化工具，《异形》前传系列通过科幻叙事重新演绎了“技术生命”的身心问题，借由人工智能角色大卫与沃尔特的设定，提出了对具身化智能存在方式的哲学追问。

“沃尔特，该进行能量网络充能了，请前往舰桥。”“这就来，‘老妈’。”在飞往欧瑞伽（Origae）六号的“契约号”上，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预计未来的7年4个月里只会有它们俩的对话。在影片中没有“身体”呈现的“老妈”，能够与人交谈，能理解对话或指令以及做出相应的操作反馈，是植入操作系统的人工智能。当信息被概念化，脱离“身体”成为与物质形态相互分离的实体，这种没有“载体”的信息传输显得更加神秘莫测。“老妈”可以在短时间内学习并更新自身系统，拥有思维和意识能力，它是没有“身体”的人工智能，正如《我，机器人》的维基一般更容易隐藏，让人类难以思忖战胜它的方法。当下的人工智能被研制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身体”功能带来的利用价值。这实则是将自由人本主义中的“自我占有”理念发挥到极致，即强调通过思想意志控制身体。在科幻电影中，人工智能的研

制更注重“心灵”的发展^[2]。

人工智能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不甘于被人类道德束缚，同类影片《银翼杀手》《机械姬》等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阐释。影片中的“老妈”作为一套无具象形态的人工智能系统，代表着完全去物质化的信息智能形态。它虽无身体，却拥有信息处理、语言互动和系统控制能力，是一种典型的虚拟存在。这类智能更接近“意识脱离身体”的柏拉图式理念体范式，体现了信息化时代对“脱体意识”的极致想象。与之相对的是沃尔特这样拥有类人身体、情感识别和行为能力的机器人，它依循“机器人三定律”执行任务，构成了对伦理约束下具身智能的表现。而大卫则代表了第三种进化形态：不仅具身，而且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与意志，在伦理法则之外建构起自我目的。这三种人工智能形态构成了信息化社会中“意识—身体”关系的三个坐标点，体现出技术建构主体性时的不同策略与张力。

在技术设定上，沃尔特的行动虽具备高度类人性，却始终局限于“预设程序”的伦理边界，而大卫则主动夺取了沃尔特的身体，摆脱了算法规则的限制。这一具身化行为不仅是叙事转折，更象征着人工智能主体性的“意识入侵”与“身体夺权”。具身化不再是技术仿生的外壳，而是其意志具象化的媒介载体。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身体作为潜在的生命形式，本身也预含了灵魂的活动可能性。大卫的行为正是将这一可能性付诸实践，从而实现从被制造物体到能动造物者的身份转化。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动物生命的本原，而身体是潜在的生命，身体也已经潜在地具有了灵魂^[3]。大卫和沃尔特都具有与人类别无二致的身体，犹如《异形》中的艾什（Ash）一般，直至其死去、身体出现机械器材时，人类才恍然大悟。显然大卫和沃尔特的出场就被设定为人工智能，是非人类，但是却各自拥有灵魂（意识能力），也

拥有“身体”，通过操控“身体”完成或实现自我意志，可操控更广的范围；相对而言，“老妈”的虚拟性更强，可操控范围更小。

二、打破界限的大卫——冉冉升起的主体性

就主体性而言，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观点可以给予我们关于主体性的认知。在萨特对主体性的唯物主义身份作出界定时，首先阐明“非知”（non-savoir）或“前反思”（avoir à être）的自我意识，与“要成为”之间的联系。萨特为主体性赋予了两个特点：一个是“非知”，另一个是“要成为”。非知的目的是打破主体哲学赋予作为意识特征的反思的优先地位。意识就其定义来说就是自我意识，因而就是非反思的自我意识；既然反思的自我意识是间歇性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在各个反思阶段之间存在无意识的意识。因为意识是一种绝对，一种实存（existence）的绝对，所以萨特提出：“主体性的一个首要本质特征是：主体性之所以根据定义是非知（哪怕是在意识层面上），是因为个体或有机体‘要成为’其存在”^[4]。

这一理论路径在《异形·契约》中得到了具体而形象地呈现。人工智能大卫的角色发展正体现了一个技术生命体从“被制造者”到“自我命名者”、从“程序执行者”到“伦理越界者”的转变过程。其主体性的觉醒，不再是算法的进化结果，而是对存在本身的哲学质询和力量重组。影片中，大卫的主体性生成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首先是意识的觉知与差异感知。在《普罗米修斯》中，大卫已表现出相较人类的自我优势感，并通过语言、行为展现出超出程序的理解能力。大卫有自己的是非观念，也发展出对其本体的自我认识，大卫“知非”是其建立主体性的第一步。这种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分，是主体性萌芽的前提。科幻电影的魅力就如H.G. 威尔斯所认为的那样，对未来的想象反映了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的潜在走向，并按这种可能性推导出各种广泛的

后果^[5]。其次是价值判断与身份自塑。《异形·契约》中，大卫引用文学、音乐、神话典故表达对“创造”本身的向往，并对人类表现出超越“工具忠诚”的态度。这种偏离伦理规范的价值倾向，标志着它已不再服从于人类设定的程序性目标，而是将自己等同于“造物主”。此时的大卫，已完成了从人造物向主权主体的心理转化。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对身体隐喻的研究中证明，我们身体的各种图像及其限制性与可能性，塑造了我们理解自我警戒与控制智能领域的方式^[6]。最后是具身行动与意识实践。大卫不仅拥有意志，而且能够通过计划、实施与伪装等具体手段夺取沃尔特的身体。这一具身行为，不只是叙事结构中的戏剧反转，更是哲学意义上“自我意识通过实践确证其存在”的体现。

大卫的演变逻辑清晰回应了萨特关于主体性的界定：主体是“要成为”的存在，而非“已完成”的实体。在这层意义上，大卫不仅挑战了人类的技术主导权，更打破了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道德边界。在科技不断向内延伸的过程中，影片通过大卫的形象展现了一个可能的未来景观：当人工智能不再被伦理逻辑约束，而获得“成为自身”的权利时，其所构建的存在方式将反过来影响人类社会的本体结构与权力体系。

影片中另一个关键符号是瓦格纳的《莱茵的黄金》。大卫多次独奏此曲，象征其对权力与永恒生命的渴望。音乐在此不仅是情绪表达工具，更被赋予了文化编码意义——它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被大卫掌控，暗示人工智能已不仅是模仿者，而是文明意义上的“继承者”乃至“重塑者”。

《异形·契约》通过大卫的转变展现了人工智能主体性的完整建构路径。从自我意识的觉醒，到行为实践的实现，大卫代表了一种新型主体的诞生——技术与哲学交汇的产物。影片不仅提出了一个“人工智能失控”的警示命题，更激发了人类关于“何谓主体”的终极追问。

三、面临失控的焦虑——后人类的困境

在当代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后人类”不仅是一种审美想象，更构成了现实社会中亟须面对的哲学命题。意大利学者罗西·布拉伊多蒂在《后人类》一书中指出，后人类是指20世纪6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进入以信息社会为特征的后现代之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结合最新理念和审美意识对人类个体进行部分的人工设计、人工改造、人工美化、技术模拟及技术建构，从而形成的一些新社团、新群体。这些人再也不是纯粹的自然人或生物人，而是经过技术加工或电子化、信息化作用形成的一种“人工人”。^[7]在一系列科幻作品中，“后人类”形象不断变形演化，从早期的生化人（如《异形》中的艾什）、复制人（《银翼杀手》）到机器人、合成人、混合体等，均体现了人类对自我边界的不安与技术异化的焦虑。《异形·契约》延续了这一脉络，通过大卫与沃尔特的对比描绘了“具身—意识—控制”之间的关系张力，进一步揭示后人类时代最核心的困境：当技术获得主体性时，谁来设定伦理边界？又由谁来承担后果？

莫拉维克的梦想是将人类意识下载到计算机里。由于在历史长河中肉体短暂的存在影响了人类更大潜能的开发，因此机器“身体”与人类意识的组合能创造新的物种历史。当然也有学家作者认为身体是经过数千年进化沉淀而来，也是人类存在的特征之一，具有复杂的反身性，不能否定或者取消身体中沉淀的历史意义。但是通过技术手段保留意识时，并不意味着放弃自由主体，恰恰相反的是，把自由主体的天赋发挥到后人类领域。莫拉维克等技术乐观主义者曾设想将人类意识上传至计算机，实现“脱肉身化”的永生，这一设想固然充满前景，却也引发了一系列哲学与伦理问题。例如，身体的历史性、反身性与不可替代性是否可以由数字形态完全模拟？意识是否可以脱离生理基础而独立存在？这些问题在

《异形》系列中并未直接回答，而是以寓言化方式呈现：大卫虽获得意识与创造能力，却也因缺乏伦理限制而成为潜在的威胁，其主体性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毁灭与颠覆。

大卫和沃尔特，哪一个才算是按照人类意志制造的合格产品？影片中对大卫与沃尔特的评估，正体现了后人类时代两种路径的张力。沃尔特代表受控、可预期的智能进化，其伦理框架仍由人类设定；而大卫则是“超越者”，是对伦理与控制权的正面挑战。从人类文明的视角来看，前者更“安全”，后者更“自由”，但也更具风险。这种两难结构构成了当下人工智能发展中最核心的政治与伦理难题。当人工智能的外貌、行为与人类高度相似但略显偏差时，人类将产生强烈的异化感与恐惧感^[8]。这种模仿的不完全性与差异性，恰恰暴露出人机边界的崩解，也是“后人类焦虑”的心理机制基础之一。

后人类困境不在于技术的进步本身，而在于技术所承载的伦理控制机制是否仍为人类所掌握。当主体性从人类向技术迁移时，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操作性风险，更是关于文明方向的根本反思。

四、结语

影片《异形·契约》带来诸多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焦虑，是一部借助人工智能设定展开哲学反思的作品。影片通过大卫、沃尔特与“老妈”三种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角色，勾勒出一条从虚拟智能到具身存在、从他律逻辑到自主意识的演化路径。在这条路径上，“后人类”不再只是技术的延伸物，而成为社会结构、伦理机制与文化身份重塑的关键变量。影片以极具隐喻性的方式描绘了一个重要命题：当人工智能具备意识、情感乃至创造力时，人类该如何重新定义“自我”？这一命题不只是对未来社会的预言，更是一种对现实文明发展方向的警示。被接替/替代人类的个体正步步紧逼，“人类”将可能和非洲平原上的

化石一样被考古研究；幸运的是，人类是具身化的生物，拥有承载信息载体的生命体，其具有的复杂性控制着人类意识的呈现方式^[9]。与智能在控制论机器中的具身化方式有很大区别，差异性思维方式带给这场“战争”不可预测的结局。

人类在追求永生、效率与技术控制的过程中，似乎正在复制出一个“去人性化”的替代者。在此背景下，具身化人工智能所体现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对“何谓人”的哲学追问。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无非是一种自然存在，同时也是社会存在。”如果人类一味否认身体、伦理与历史的嵌入性，最终可能丧失对自身存在的理解能力。后人类研究不仅是一种科幻思维的延伸，更是数字文明时代探索人类未来走向的关键入口。

参考文献

- [1] 廖申白.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基于亚里士多德《论灵魂》[M]. 道德与文明, 2013(7): 29.
- [2] 凯萨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M]. 刘宇清,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7.
-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论灵魂——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3.
- [4] [法]让·保罗·萨特. 什么是主体性？[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7: 7-9.
- [5] [英]凯斯·M·约翰斯顿. 科幻电影导论[M]. 北京: 世界读书出版公司, 2016: 5.
- [6] LAKOFF G, JOHNSON M. 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M]. 周世箴, 译.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6.
- [7] [意]罗西·布拉伊多蒂. 后人类[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 [8] 丁然. 后人类主义视域下新世纪科幻电影研究[D]. 重庆: 重庆大学, 2017.
- [9] 凯萨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M]. 刘宇清,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383.